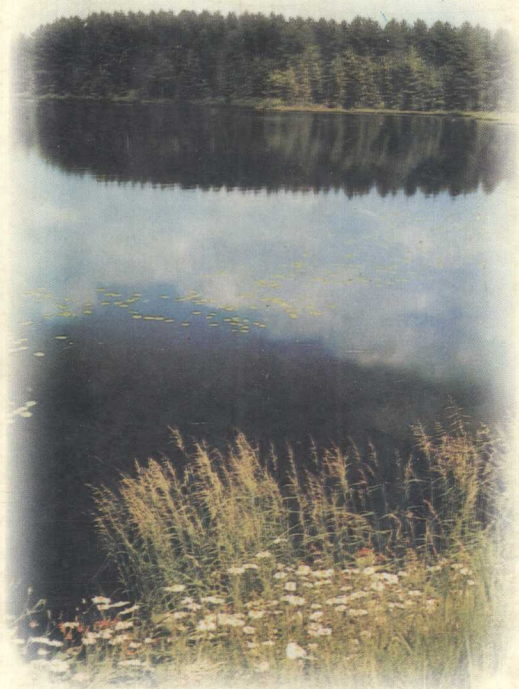


精美散文

艺术·哲思卷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精美散文

(艺术哲思卷)

编者 王嘉陵
张育仁
吕 选

责任编辑：何启明

封面设计：文 涛

精 美 散 文

编者 王嘉陵 张育仁 吕 选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枝城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2印张 300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7-5371-2540-6/I·859 定价：13.8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读者翻阅的这套《精美散文》可以看着是编者前一套散文（九五年出版）的姊妹篇。那套书共三册，每两卷成一册，分别为“文化哲理卷”、“青春温情卷”、“幽默杂趣卷”。这一套书在选编原则上仍与前一套相同，以“美文”为入书之标准，坚持“散文应该是美文”这一选编初衷。

为在体例上与前一套相一致，这套《精美散文》仍以两卷成一册，分别为：

第一册，精神家园卷、艺术哲思卷

第二册，人文雅趣卷、游踪心旅卷

第三册，亲情友情卷、市井风情卷

不同之处仅在于，为遵从读者的阅读习惯，不致于使读者感到诘屈聱牙，每册以其中一卷的名称作为册名，另一卷内含其中，即：第一册为艺术哲思卷，第二册为人文雅趣卷，第三册为亲情友情卷。

编 者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09		山王燕和高余空	辑余林
79		普义主燃里帕斯真个一	平国凤
201			黎 宗
111			分次米
811			中米
124			即知王
031			薛 燕
131			林 幸
141			彭小玉
051			零 幸
921		“升殿道” 帕里《义海图三》	蒙 王
181			散其昌
181			志承崇
精神家园卷			

西 川	乌托邦札记.....	1
李 超	形而上死.....	8
王充闾	走向大自然.....	16
汪曾祺	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21
周国平	悲观、执着、超脱.....	25
朱学勤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30
丁 东	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	41
秦 苏	伟大的孤独.....	46
雷 颐	文人还会被尊敬么?.....	50
吕 澎	最是文人有自由.....	56
许纪霖	狂出真性情.....	62
陈平原	学者的人间情怀.....	69
陈平原	千古文人侠客梦.....	76
谭立铸	大隐隐于市.....	83

杨念群	空余高咏满江山.....	90
周国平	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97
宗 璞	三松堂断忆.....	105
张汝伦	认真地思想和生活.....	111
张中行	关于 吾 师.....	118
王晓明	严酷时代里的证词.....	124
萧 乾	想当初, 胡乔木.....	130
李 辉	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	134
王小波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	144
李 零	汉奸发生学.....	150
王 蒙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159
冯其庸	瓜饭楼上说金庸.....	164
张承志	真正的人是X.....	168
刘小枫	记恋冬妮娅.....	177

艺术哲思卷

王 康	大道·大启示.....	188
廖亦武	阿拉法威笔记四章.....	200
韩少功	心 想.....	210
王家新	“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写作.....	215
申慧辉	痛悔生命只有一次.....	218
李 钢	八月十五日.....	222
郇 明	孤独是真艺术家的天命.....	226
张育仁	第二个王国维.....	232
杨斌华	一九八九: 悲情与梦想.....	236
王小波	我看国学与老三届.....	240

周国平	人生寓言.....	248
吴 亮	游戏的权利.....	252
吴 亮	论学院派.....	257
朱 晖	“知青情结”辨.....	262
孙甘露	在天花板上跳舞.....	267
孙甘露	写作与沉默.....	272
王东成	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	277
吴 方	文人的命运.....	281
陈鼓应	潘金莲的悲剧.....	288
朔 望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294
相 英	金斯堡在中国的城市散步.....	297
崔卫平	良知战胜黑暗.....	302
郝 建	义和团病的呻吟.....	308
刘心武	“大院”里的孩子们.....	314
李 皖	2000·蛋和可耻的人.....	321
葛兆光	唐诗过后是宋词.....	327
尹吉男	有关配猪的文化抢答.....	335
扎西多	正襟危坐说废都.....	338
桑 晔	说破狗熊惊煞人.....	344
倪文尖	不能失去张爱玲.....	348
王天兵	非梦文学和王朔.....	351
章启群	谁的指令.....	355
周翼虎	壮烈地走进荒谬.....	359
张抗抗	商品大潮与文化沙滩.....	365

乌托邦札记

四川

一五一七年二月十四日前后，伊拉斯莫在致友人克拉夫的信中写道：“您读莫尔的《乌托邦》时，会觉得身子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书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伊拉斯莫在这里说的，如果不是灵魂出窍的感觉，那又会是什么感觉呢？在四百七十四年后的今天，在阅读《乌托邦》第二部时，我们依然会被托玛斯·莫尔那从容不迫、略带欣喜的描述所带走，远离物质生活所由滋生的欲望、不公和罪恶——

“乌托邦岛中部最宽，有二百里(passus)。这个岛大部分绵延着这样的宽度，只是两端渐渐地窄下去。假如用圆规从这头划到那头，就是一个五百里的圆周。全岛看来如同半轮新月。”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无不宏伟壮丽。”“每座城有四家医院。”“每座城除了郊区外有六千户，每户的成年人

不得少于十名，也不得多于十六名。”“他们没有酒店，没有妓院，没有令人堕落的场所，没有贼巢匪窝，没有不法之徒的集会。”（《乌托邦》，戴镗龄译，商务印书馆）

应该说乌托邦是思想家们道义、智力和想象力的结晶。在莫尔脑海中这个非物质的社会里，居民们有着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铁比金银贵重，因而锁在奴隶身上的长链大铐是用金银做成。他们衣着简朴，甚至国王也无需用衣着或王冠显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他的标志仅仅是一束玉米穗；同样，高级教士的标志也仅仅是一支蜡烛。乌托邦人每天工作六小时，他们把空闲时间花在科学研究和阅读诗歌与历史上。他们把美德看作心灵的镇静剂。唯有高尚的事物才值得他们去献身。

尽管“乌托邦”(Utopia)一词来自莫尔，但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谈论乌托邦的人。在中国，古老的《礼记·礼运篇》曾经用一百零七个字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至清末，康有为又在其《大同书》中系统地要求废除家庭私有制，实现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阶级，实现男女平等，建设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作为伦敦城里“最有声望和最有学问的子爵”，莫尔必定认真研究过西方前辈先贤的各种思想，其中，柏拉图放大了个人，将他的“理想国”高置于道德动机调节之下，摈弃经济动机和粗俗欲望，使得人间的兄弟之谊在理性的锤打下成形，闪耀。圣奥古斯丁则要以他的“上帝城”取代行将崩溃的“凡人城”；云蒸霞蔚的幻景升腾于寸草不生的旷野，他亲眼看到了上帝之爱。或许莫尔并未比其他乌托邦思想家表达出更多的善，但是令我们有灵魂出窍之感的却是他的《乌托邦》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和谐之美。他把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勾划出一个既不是骄奢淫逸也不是苦行僧似的理想社会。

以人类为背景，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属于同一个息息相通的群体。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狂想，那么这些出类拔萃的思想

家们就是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各自述说着自己的狂想，同时又交相辉映，传递着熊熊火炬的先知。看来笼统地谈论乌托邦必然会使我们感到茫然无措，尽管他们某些相互矛盾的信条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作用，但他们谁也逃脱不了孤独的命运。试想，那些以家庭为单位，在夏季傍晚临街打牌的人，那些在打烊前无所事事的饭馆小伙计们，那些偏方治大病的野郎中，那些由轿夫摇身一变而成为出租汽车司机的暴发户们，他们与乌托邦有着什么意义上的关联呢？

让我们善意地理解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在《四季随笔》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我憎恶富人特权（我难道不记得伦敦的那些地方吗？我站在那里，穷愁潦倒，心急如焚，眼睁睁地望着那些有钱人熙来攘往）。但是，对于同居的地道穷人，我并不感到他们与自己是一类人。理由极为简单，我对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我了解穷人，我还知道他们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我知道那种我几乎可以认为理想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朴素的生活啊），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使之理解的话），只会感到厌倦与轻视。吉辛没有讲出他与普通下层人民究竟有什么不同。而且在这里，他还无意中表达了另一个错误的观点，即富人与精神生活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对于富人的庸俗无聊、暴戾残忍或者是认识不够，或者是由于自己已荣升富人阶层而过于宽大。关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区别，莫尔在《乌托邦》里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吉辛：乌托邦的梦想不是以欲望而是以蔑视欲望为基础。

现世的国家无不信奉发展的原则，而一般大众无不信奉积累。对他们而言，物质积累、知识积累、德行积累是指向幸福的通衢大道。他们依照如下线索构筑道德，即：欲望产生行动，行动产生行动的准则，最后准则上升为道德。但是这个道德与

乌托邦思想家所说的道德不同，因为积累只能达到“更好”，却无法达到“最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乌托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否定了社会生活，它与大众无干，它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相矛盾，一旦它与大众结合，便会导致一场灾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乌托邦是反人民的——尽管在乌托邦内部人人平等，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举凡士、农、工、商、邮政、电线、铁路，无非工而已。”亨廷顿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比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乌托邦与大众理想的差别。他指出：“知识分子对社会怀着疏离感，农民怀着不满意感；知识分子的目标是广泛的，理想型的，农民的目标是具体的，有关利益分配的。”

在乌托邦思想家中，除了弗朗西斯·培根这个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大多数人通常拒绝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和科学进化论观点。这种拒绝态度赋予乌托邦以某种终极价值，并不可避免地使它与其他社会形态相隔绝。似乎不存在走向乌托邦之路，环绕着它的不是旷野就是大海，没有国家与乌托邦毗邻。乌托邦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尽善尽美。这种伦理和政治上的唯美主义有时走向极端，就显露出残酷的一面，例如，不论是柏拉图，还是康帕内拉，都认为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最高权威应当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造就优秀的下一代应当根据哲学的规范来分配最好的男女生育者。不过，任何完美的事物中的确蕴含着人类梦想的尊严。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建于赤道上的一座小山；它的七个城区，即七个同心圆，以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太阳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太阳”，实际上体现了早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巨人的渴望：

要获得“太阳”称号的人，一定要熟悉各民族的历史，他们的一切风俗、宗教礼仪和法律，要熟悉各个共和国和君主国的情况，以及立法者、科学和手工业的发明家，也要了解天体的结构和历史。……同时，也应该懂得物理学、

数学和占星学。……人们对“太阳”的要求主要是懂得形而上学、神学、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原理和论证；万物的同异关系、世界的必然性、命运与和谐、万物和神的威力、智慧和爱、存在物的等级，它同天上、地面上和海中的东西以及神所理想的（凡人也能了解的）东西的类似关系……

乌托邦有如理想主义的风暴眼，每每以稳定的状态呈现。在那里，一切矛盾达成了妥协，因而它自身绝不酝酿崭新的创造和革命；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早已确定，因而不存在嫉妒、倾轧和阴谋；人们的一切欲望得到了满足，因而欲望被彻底取消；此外，由于它是想象的结果，因而想象就在那里永远地结束了。

柏拉图认为，国家不是根本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其任务是提出人类理想并教育公民接受使他幸福的特殊的道德准则，因而能对国家做出最大贡献。（见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九〇年版）同样我们可以指出，大多数乌托邦思想家所赞同的公有制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公有制的职能应该是消除欲望、剥削和不平等，从而使人人得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在这种对于公有制的迫切向往深处，埋藏着乌托邦思想家对于人性的信赖：他们以为，剥去生活邪恶的外衣，就能够发现人性善的种子。康有为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摩莱里由于充分相信人类具有良好的品德，因而对人类的进步抱有信心。傅立叶把这种信赖推向极端：他认为，听任人类情欲的自由发展，便可以成功地在全人类解决最大的幸福问题。

人性不是什么太高，也不是什么太低的东西，它以欲望为动力，以需要为方向，以道义为法则。乌托邦思想家抽象了人类理想。乌托邦的一切美，恰好映照出现实的一切丑，这使我们得以以灵魂出窍的方式反观我们身处的现实。他们对社会有

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往往是严厉的，我丝毫不怀疑正是批判给乌托邦思想家带来了有关乌托邦的灵感。他们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思想家，就在于他们没有停步在一般的批判之上。他们要求人类接受理想的光辉。但是，从这里开始，乌托邦思想家走向了理性的反面：在他们激情的至高点，他们的声音完全非理性化了。早在以色列的先知时代，阿莫斯就这样大声疾呼：

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
使正义如江涛滚滚。

这是情感的声音，而不是理性的声音，这是信仰的声音，而不是怀疑的声音。怀疑是理性之母，理性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由于乌托邦思想家对于人性的模糊认识，由于他们对个人的相信，致使集权制成了乌托邦的寄生卵。殊不知人性善乃是专制的温床，开明的君主、好人政府，乃是人们对集权所能抱有的最高期望。

这样，另一种尖锐的声音便强大起来，分享了理性的光荣。托玛斯·霍布斯从人性恶的立场引出了他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西方民主原则。马基雅维利说：“不论谁想建立一个国家，并给定法则，他就应该预先假定人都是凶恶的。”这种人性恶的观点与那些相信人性善的乌托邦思想家多么格格不入。在乌托邦思想家中，只有圣西门和哈林顿持有与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相似的看法。哈林顿在《大洋国》中坚持将法律置于人之上；而在其他乌托邦思想家的著作中，法律条款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像乔治·奥威尔和阿尔德斯·赫胥黎那样写作“反乌托邦”，实在是出于历史的误会。他们看到了乌托邦与生俱来的反讽效果，却忽略了乌托邦背后的精神意义。乌托邦是一个狂想，并且只能是一个狂想，它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几乎是等同的。但这却并不能说明乌托邦的出现是一场历史闹剧。理想借乌托邦昭

显于苦闷的心灵：当它从街头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成为我们个人重要的精神财富时，它使我们感受到托生为人的荣耀和尊严。那些乌托邦思想家一定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想，并以此平衡了他们深深的孤独感。据说圣西门在向斯塔尔夫夫人求婚时说过这样的话：“夫人，正像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你也是最伟大的女人；并且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将会更加伟大。”这种自大狂式的表白，一定会被肖伯纳那样的聪明人紧紧抓住，大加嘲讽，但我们的确能够从其中听出一种对于完美的崇拜。这种崇拜或许是盲目的，但有哪一种理想主义没有它那一份盲目呢？

如果说乌托邦思想家们没能以他们对于完美事物的崇拜治愈社会沉痾，那么他们起码发现了梦想的黄金，告诉我们人是主动的，并由此肯定了个人的价值。以色列先知伊齐基尔认为，个人的灵魂是一个其本身就具有绝对价值的单位；倘若要使社会达到完善的境界，那将不会整个地实现，而是必须分别对待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乌托邦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的个人属性。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都能产生一个乌托邦，也就是说，未来并不能对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精神价值。由于多数人无从超越他们自己，因而社会对于那些乌托邦思想家，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必须保有一份尊敬。在物质生活中，是他们，让生活惭愧，是他们，让我们看到无比辉煌的幻景和理想的胜利，这幻景曾经使托尔斯泰在最后的岁月里极力摆脱贵族特权和私有财产，从思想的人变成行动的人，最后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尽管一切乌托邦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但包含在这所有失败中的，不仅仅是美，其中更包含着人的生命。

形而上死

李超

诗门以内的景致，我所知很少，算是外行。但海子一九八九年春的死讯，却是听说了的。他写过《亚洲铜》，“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南京的朋友寄来了一本《海子骆一禾作品集》，觉得突兀。由于孤陋，我不知道海子死后只两个月，骆一禾也接踵而去。骆一禾患先天脑血管病，编纂出版海子诗集时，死于脑溢血。诗集没出，他也搭了进去。死的时候，海子二十五岁，骆一禾二十八岁，都没到写出最成熟的诗章的年龄。用一本作品集将两位诗人合墓而葬，恰似还了天愿。

这是一部烫手的书。除海子、骆一禾留下的各类作品，书里也辑下了不少友人的文字，涉及了诗，诗人，诗人之死。他们排成了送葬的队列，肩起棺木，向诗的深部徐徐歌行。

死是一个诱人的话题，死留下的空白巨大，每一活人都能从中寻得一席。所以死者的坟莹，就是生者说话的客室。死易

被诗化。诗人的死每每是绝唱、是大话题，因为“诗人是一种精神”。

对海子死因的解释有许多种。一是，海子写完《太阳》，创造力面临绝境，写不出诗，宁愿一死。另一种说法近乎世俗，即海子以死，来抬举其诗的价码。这些说法都似曾相似，不知尾随了多少诗人的自杀，很容易流通。骆一禾在一封信里反对了海子创造力穷尽的说法，因为它必然导致海子以死换取名誉的判断。他说，有过天才生活的人，大都死于脑子，海子在遗书里说，他的思维混乱，头痛耳鸣，间有吐血和烂肺的幻觉，也是脑疾。骆一禾说，“这里有命运因素”。后来他本人也死于此症。两种说法，一种命运，也就是诗人的命运。艺术是了艺术，无不奴役艺术的主人。诗是艺术的贵族，诗人在诗下，就尤其轻贱，可谓奴婢。日本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在棋盘上写过不少大诗）也体验到了这种奴役，棋道高处，他屡次险生。他曾对中国棋手说过，棋手必须专一棋艺，甚至要牺牲世俗幸福。这话使人想起荣格，他说，伟大艺术家的传记证明了，“孕育在艺术家心中的作品是一种自然力，它以自然本身固有的狂暴力量和机敏狡猾去实现它的目的，而完全不考虑作为它的载体的艺术家的个人命运。”（《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说了这些，只是想说，诗人手里没有个人命运在握，也无法以死从事任何交易。诗主持着生命，将诗人一丝不苟地抛入诗的实践。当然，平庸诗人不提。

海子写麦地，骆一禾也写麦地。他们执迷于麦地，把这一意象呈送给中国诗界，有人就称其为“麦地诗人”。他们的诗多着墨于北方乡村，而麦地诗则是其中的上品。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

中一县人有”也因，题诗大意，即此意也。海子《答复》有诗

麦地，我乡村里的部落／你在哪儿呵／你怎不叫我世代的诗人如梵

·高更平近处有一民。天一。有出不 骆一禾《久唱》

试不，星座闪闪发光／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只见心

板脏，只见青花／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

卷各邓寒天以于诗意自然心字成因。 骆一禾《壮烈风景》

这里，麦地抽象了，枝蔓细节均已剔除，只剩下麦地生命

本身，和诗人焦灼痛苦的内心相照。麦地是丧失，又是依恋，

同时还是多种指向的逼问和抒情。海子在《诗学：一份题纲》

里谈过对大地的认识，或可参比：诗人歌唱大地，正在于失去了

大地，漂泊的灵魂必得寻找替代，就是欲望。大地恢宏的生

命力只能用欲望来指称；麦地上只有诗人的内心冲突，它渴求

的是对话，更深的和解。

全 荷尔德林和里尔克写过大地，埃利蒂斯写过爱琴海，但麦

地更贴近我们。麦地使人联想很多，都和我们民族情感的实质

相关，麦地既不在地狱，也入不了天堂。麦地诗让人心颤，所

以心颤，还在于道出了生死，是生死的渊薮。燎原在《孪生的

麦地之子》中写着，这些诗“触及了死亡光明的核心”。雅斯

贝尔斯讲过一种“母亲神观念”，说大地孕育万物，抚爱它们，

使其成熟，但又扼杀它们，毁灭它们，使其复归自己的子宫（《悲

剧与超越》）。人有诗，命主替我主。是父何非我非我非我

麦地使人想起梵高。

海子写过梵高，例如《死亡之诗》之三《采摘葵花》，“我

仍在沉睡／在我睡梦的身上／开放了彩色的葵花／那双采摘的

手／仍像葵花田中／美丽笨拙的鸭子。”骆一禾也写过梵高，

有纪念梵高的《向日葵》：

葵花，你使我的大地如此不安／像神秘的星辰战乱／上

有鲜黄的火球笼盖／丝柏倾斜着，在大地的／乳汁里／默